

杨慎的时人诗集评点本与明中叶诗坛格局

何 振

内容摘要:杨慎评点的时人诗集今存 18 种,占明人评点明诗别集总数的九分之一强。他在西南地区评点的时人诗集大多在江南出版,这不仅影响了《列朝诗集》《明诗综》等选本的采摭书目,更进一步确立了其“独立门户”的明诗史地位。杨慎综合使用编选、批注、圈点、撰写序跋等评点方法,既深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又在实践中有所超越,并借此推广六朝诗学。以杨慎为中心的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至少包含 43 位文人、38 种诗集,呈现出明中叶诗坛的局部组织结构。时人诗集评点既能凝聚旨趣相投的文学群体,打破地域隔阂以建立文学联结,亦能清晰划分不同文人群体的边界。相较于茶陵派、前七子等传统文学流派,广评时人诗集是杨慎构建文学交游网络、培育文学共同体的核心方式。

关键词:杨慎 评点 关系网络 诗坛格局

诗歌评点肇始于南宋,而真正意义上的同朝人诗歌评点到元代才出现,今存此类评点本不足 10 种^①。明人评点的明诗别集现存 160 种左右,而杨慎评点过李梦阳、张含、严嵩、顾应祥、木公、周复俊、朱曰藩、顾起纶、刘玉、陈凤等 10 位同代诗人的 18 种诗集,占总数的九分之一强。杨慎评点时人诗集的数量远超前人,有明一代亦无人能出其右。以时人诗集评点为纽带,将评点者与被评点者串联,可构建出一张以杨慎为中心、涵盖至少 43 位明代文人的同代诗集评点关系网络。这一规模的评点网络,是明代诗歌史上区别于前代的独特文学景观,标志着以同代诗集评点为核心载体的新型文学交往关系正式兴起。有鉴于此,本文将杨慎的时人诗集评点、出版活动与文学史的还原和书写相结合,考察其评点诗集的

^①罗鹭:《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第 253—272 页。

流传脉络与文学史价值,探析社会关系影响下的评点策略与诗学推广,阐释评点关系网络对明代文学交往、文学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作用,以此还原明中叶诗坛的生态格局与组织结构。

一、从西南到江南:杨慎时人诗集评点本的生成与流转

(一)在贬谪地评点时人诗集

杨慎评点的时人诗集,就现存文献而言,最早可追溯至嘉靖十九年(1540)隆昌张氏家塾刊刻的张含《禺山诗》四卷^①。在此之前,杨慎编选过张含多种小集,《禺山诗自叙》说:“(杨慎)乃即含嘉靖甲申后所为诗而择之,且锡名以为集,赋辞以为序,而《张子小言》《乙未鸣》《吟遂卷》《艰征集》由此其成也。”序中又称自己在杨慎编选之前,“竭力于诗”而“弗通于诗道”,经评点后“集可观矣,梓可传矣……其允借附于杨子”^②。此后张含多次和杨慎合作评点、出版李梦阳、李白等人诗集。嘉靖二十二年,杨慎评点《空同诗选》四卷,由张含的百花书舍刊印;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张含又先后出版由自己精选、杨慎批点的《李诗选》《唐诗绝句精选》等^③。此外,杨慎曾评点严嵩诗集,所作《铃山堂诗集序》曰:“往年,唐子荐归自京师,相见,出此集观之。愚妄有批评,子荐取而镌之以传。”^④嘉靖三年,杨慎因议大礼而遭贬谪,后刑部曾于嘉靖十六年二月请旨赦免,此举实系刑部尚书唐龙所为^⑤,而唐氏早先亦曾评点严嵩诗集并于嘉靖十年为之撰序。杨慎评点严嵩诗集,应该存在较为现实的考量。从张含

①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第186页。

②张含:《张愈光诗文选》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1册,黄山书社,2016年,第470页。

③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含百花书舍刻本《空同诗选》四卷(索书号:02432。以下如无特别说明,所引此书皆据该本),又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隆昌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索书号:13501);天一阁博物院藏嘉靖二十六年(1547)隆昌张氏家塾刻本《唐诗绝句精选》(索书号:善4656)。

④杨慎:《铃山堂诗集序》,严嵩:《铃山堂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3809),叶十七。另,上海图书馆藏孙伟、杨慎评点的明嘉靖刻本《铃山诗选》七卷(索书号:线善855882-8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杨慎评点的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可刻本《铃山堂诗选》四卷(索书号:LSB/495)。

⑤《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七,《明实录》第43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155—4156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二〇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5328页。

到李梦阳再到严嵩,杨慎早期评点对象的选择具有主动性,所包含的意味也经历了从友情到商业、政治的变化。嘉靖二十五年,丽江土知府木公邀请杨慎评点其《仙楼琼华》还需要张含等做介绍人^①。在此之后,杨慎和被评点者之间的关系由主动评点或需要介绍人变为直接被邀请,由挚友、名家、土官扩展到云南、四川的地方官员。

伴随杨慎诗歌评点声名的形成与确立,雅好诗文的官员来西南任职,多主动邀请他评点诗集。嘉靖二十八年,顾应祥再任云南巡抚,“出《归田诗稿》,有巨三卷相示”^②,又替朱曰藩将其《池上编》带给杨慎评点^③。三十一年,刑部员外郎刘常“奉敕审录云南、贵州囚狱”^④,邀请杨慎评选乃父刘玉诗文集^⑤。三十二年冬,顾起纶任滇南幕府参军^⑥,主动向杨慎出示《玄言斋集》^⑦。杨慎在贬谪后仍与家乡四川多有联系,晚年长居泸州,因而蜀地官员同样慕名邀请他评点诗集。陈凤曾任四川参议,邀请杨

①杨慎:《仙楼琼华序》,木公:《仙楼琼华》卷首,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滇甲 436/4080.4),叶一。

②杨慎:《簪溪归田诗选序》,顾应祥撰,杨慎评选:《簪溪归田诗选》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云南知府陈光华刻本(索书号:11760),叶一。

③杨慎:《升庵杨公书》,朱曰藩:《山带阁集》附录,《扬州文库》第98册,广陵书社,2015年,第266页。

④黄图昌修,刘应举等纂:《〔康熙〕万安县志》卷八,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索书号:地 250.153/32),叶九。

⑤杨慎:《执斋先生选集叙》,刘玉撰,杨慎评选:《执斋先生选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索书号:线善 827064-67),叶一。

⑥王问:《书玄言斋集》,顾起纶:《玄言斋集》卷首,《无锡文库》第87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⑦杨慎:《玄言斋集序》,顾起纶:《泽秀集》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郡朱氏竹素斋刻本(索书号:402.6 12485),叶十五。按,顾起纶在云南所撰《昆明集》由杨慎编选和皇甫汈评点,有嘉靖三十四年杨慎《书昆明集》和皇甫汈《昆明集序》(顾起纶撰,杨慎选:《昆明集》卷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昆明五华书院刻本,索书号:平图 015977,叶一至二)。顾起纶《泽秀集》为顾氏诗歌选集,包含王问、李文麟、杨慎、皇甫汈批注,其中带有杨慎批注的《偶寓省直答万给事》《登遐观亭作》等诗,又分别见于单行本《玄言斋集》《昆明集》(二诗标题有改动),据此可知杨慎应评点过《玄言斋集》《昆明集》。

慎评点其《清华堂稿摘存》^①。地方官员的流动,一方面让杨慎能够超越自身活动空间和一般社会关系的局限,接触到像无锡顾起纶、宝应朱曰藩等来自各地的被评点者;另一方面也使得他难以对这些诗集进行长期持续的评点,但能推动其时人诗集评点本走出西南,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形成影响。

杨慎与被评点者虽然存在像顾应祥那样当面授受诗集的情况,但更多的是类似于闵齐伋所说“昔升庵阅古有得,辄以示禺山,谓之‘千里面谈’”^②。长距离的书信往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碍评点者与被评点者之间的交流,如陈凤托人转交朱曰藩诗集、手迹给杨慎时曾遗失手迹^③。皇甫汈说:“余在滇中,杨升庵寄书云:趣殊者,背驰面舛,日进前而不覩;道同者,胶黏漆濡,遥闻声而相亲也。”^④能与作者志趣契合是评点者的理想,然而书信联系较之当面交流仍有不足。对此,杨慎曾说:“兹读佳什,有印鄙见矣,敢僭及之,何日面覩以尽?”^⑤作为评点者,他更希望同被评点者面谈来证明评点的准确性。

作者与评点者除书信交流外,还存在通过中介传递信息的情况。木公邀请杨慎评点诗集主要通过梁霄正传信,《雪山诗选序》说:“予亦因中皋梁子霄正缄其《万松吟卷》,洎《仙楼琼华》序之,已传攻梓矣……中皋子又属予合前数集,汇选其尤,将镌之玉湖精舍以传。”^⑥代理人介于作者和评点者之间,往往会参与其中。例如杨慎定名、评点《仙楼琼华》和评选《雪山诗选》,屡有梁霄正的建议。评点严嵩诗集的情形与之类似,《振秀集小引》曰:“兹又令顾子选为此集,而重梓昆明。”^⑦此时的代理人梁

①杨慎:《升庵先生诗启》,陈凤撰,冯惟讷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附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12159),叶一至二。

②闵齐伋:《附空同诗选》,李梦阳撰,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卷末,云南省图书馆藏明闵齐伋朱墨套印本(索书号:甲436/4047.1),叶一。

③杨慎:《升庵先生诗启》,陈凤撰,冯惟讷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附录,叶二。

④皇甫汈:《解颐新语》卷五《矜赏》,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2册,齐鲁书社,2005年,第1400页。

⑤陈凤撰,冯惟讷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卷首,叶二。

⑥杨慎:《雪山诗选序》,木公撰,杨慎批点:《雪山诗选》卷首,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滇甲436/4080.5),叶二。

⑦杨慎:《振秀集小引》,严嵩:《振秀集》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顾氏昆明刻本(索书号:402.6 11725),叶一。

霄正、顾起纶,不仅是诗集评点的建议者,亦成为其出版者。

(二)评点本的流转与明诗史书写

相较于严嵩诗集在各地的大规模刊行与传播,杨慎所评点的时人诗集出版地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公《仙楼琼华》《雪山诗选》等由其玉湖精舍自刻,云南巡抚、长兴顾应祥《箬溪归田诗选》由云南府知府陈光华刊印;二是四川,四川提学副使、云南左布政使、昆山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梓于蜀中”^①;三是江南,刘玉《执斋先生选集》由其次子、嘉兴知府刘恂在嘉兴刊印^②,张含《升庵选禺山七言律诗》由常州知府、同乡邵惟中邀请无锡华云刻印^③;顾起纶《泽秀集》由吴郡阊门探桥朱氏竹素斋刊印。原先在云南、四川刊刻的诗集,许多后来又在江南出版。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既“载梓于玉邑(昆山)”,又有乃孙周玄暉刻本^④;朱曰藩《池上编》嘉靖三十四年由四川副使、归安陆稳在任上刊刻,陆氏次年离职后重刻于湖州,遂有牌记“嘉靖丙辰春三癸亭重雕”^⑤;李梦阳《空同诗选》被嘉兴沈启南、乌程闵齐伋分别重刊^⑥;木公五世孙木增与常熟毛晋汲古阁合作出版木公《雪山诗选》等著述^⑦。大体而言,严嵩、顾应祥诗集的出版得益于政治力量,刘玉诗集的出版和木公、周复俊诗集的再版由家族后代主导,李梦阳、张含、朱曰藩、顾起纶等人诗集则由商业因素推动出版。

出版和评点之间的空间、时间跨越,客观上也导致杨慎无法直接掌控自己所评点诗集的最终面貌。这些诗集刊行后,除却批注位置、卷次编

①周复俊:《泾林诗文集》卷末周玄暉跋,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周玄暉刻本(索书号:09293),叶二。

②刘存义:《后跋》,刘玉撰,杨慎评选:《执斋先生选集》卷末,叶二十二。

③华云:《禺山律选序》,张含撰,杨慎选:《升庵选禺山七言律诗》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锡山华云刻本(索书号:11774),叶一。

④周复俊:《泾林诗文集》卷末周玄暉跋,叶二。

⑤朱曰藩撰,杨慎批选:《池上编》卷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癸亭重刻本(索书号:12222),叶十。按,陆稳履历详参吴巩修,王来遴纂:《[嘉庆]邳州直隶州志》卷二四,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刻本(索书号:地 280.39/135),叶七。

⑥陆艳芳:《杨慎〈空同诗选〉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雷磊指导),2019年,第54—65页。

⑦郑伟章:《毛晋代丽江木增刻书略述》,《文献》2009年第4期,第118页。

排、圈点标识等形制差异外,评点文本亦被大幅加工润改。有些是尽可能全地网罗所有诗歌和评点,造成杨慎评而不选或与他人同时评点的假象,如严嵩《钤山堂集》以及周玄暉刊刻的周复俊《泾林诗文集》皆刊印杨慎评语,且属于全集,将杨慎等评点者弃选的诗作一一收录。有些则进一步删削,导致评点者原有主张的偏离,如杨慎《玄言斋集序》赞赏的15句诗仅有5句见于《泽秀集》,是因为作者顾起纶“鉴识颇精,自律更严,合诸家之选而手抄之,所取故不寥寥菁秀哉”^①;周复俊则直接毁弃杨慎评点,“用修所评定《泾林诗集》,尝梓于蜀中,载梓于玉邑,而自谓中有弗当意者,竟再毁之”^②。明人诗集评点在成书过程中所衍生的诗作底本、评点稿本、评点原刻本、汇评印本等各类原始文献,几乎无完整存世。今所见传世文本,多为收录评点的刻本选集或全集,仅能反映评点诗集的某种完成形态。加之评点者并未直接参与刊刻出版,其与出版者之间的时空隔阂,导致完成状态的评点本诗集中评点时间层次的消失。

就作者籍贯、出版地区来说,杨慎评点的时人诗集绝大部分指向江南,自然更容易在江南传播,由此影响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等选本的采摭书目。《列朝诗集》利用的杨慎评点本约8种,包括刘玉《执斋先生选集》、张含《禺山诗选》《禺山七言律钞》、木公《雪山诗选》、周复俊《泾林诗文集》、朱曰藩《池上编》、严嵩《钤山堂集》《直庐稿》^③;《明诗综》诗人小传或《静志居诗话》也记载朱彝尊阅读过杨慎评点的刘玉、严嵩、张含、周复俊、木公等人诗集^④。钱谦益甚至借这些评点本塑造杨慎的诗歌史地位:“杨用修评定其(指朱曰藩)诗,得七十四首……其为序,极言近世蹈袭之弊,而深许子价之诗,以为异于世之学杜者,则用修、子价之诗,其流派别于献吉,从可知矣。”^⑤该观点后来被沈德

①顾起纶:《泽秀集》卷首洪樵识语,叶十九。

②周复俊:《泾林诗文集》卷末周玄暉跋,叶一至二。

③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丙集第三,第2873—2874页;丙集第十五,第3819、3827—3828页;丁集第三,第4161页;丁集第七,第4533—4534页;丁集第十一,第5097—5098页。

④朱彝尊选编:《明诗综》,中华书局,2007年,卷二七下,第1393—1394页;卷二八,第1470—1472页;卷三七,第1824—1825页;卷四一,第2025页;卷九四,第4440页。

⑤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丁集第七,第4533页。

潜和四库馆臣接受,认为杨慎“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①，“于明代独立门户”^②。文学史建构固然依赖静态的文学书籍,但这些书籍的动态流转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杨慎时人诗集评点本的整体传播路径高度趋同,使之在江南发挥“书籍群”的效力。江南的批评家因此更易整体取用该“书籍群”,从而将杨慎及评点本作者视为明诗史上的“流派”“门户”之类文学共同体。

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超越:评点实践的双重性

(一)评点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张力

杨慎综合运用编选、批注^③、圈点、撰写序跋等多种方式评点时人诗集,张含《禺山诗自叙》说:“杨子复谓诸集之析而未萃、近作之增而未续,乃为之差择焉而去其瑕,乃为之批点焉而表其瑜,乃为之跋辞焉而缀以玉。”^④《空同诗选序》又说:“吾友升庵杨子选焉,总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或点、或圈、或批。”^⑤不同于一般的阅读,评点者直接进入作者的作品生产,评点成果最终将呈现给包括作者在内的新的读者。时人诗集评点是社会关系的再现和受其影响的产物,评点者往往需要考虑与作者的关系,在彼此之间寻求平衡。杨慎则并未拘泥于此,在社会关系的形塑作用外有所超越,通过“差择”“批点”“跋辞”等方法构造出作品“去瑕”“表瑜”“缀玉”的新面貌。

作为评点者的杨慎,其所撰集序通常将评点功能作为一种“构件”^⑥使用。面对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他会采取不同的表述模式:

一方面,针对评点所造成的求精与求全之间的矛盾,序文通常引用典故来阐释缘由。如果被评点者是挚友或知己,杨慎仅采用元结编选《箴

①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64页。

②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2页。

③本文所称“批注”特指与具体诗歌联系在一起的眉批、夹批、尾批等评论,“评点”则表示包含编选、批注、圈点、撰写序跋等多种方式的综合性批评。

④张含:《张愈光诗文集》卷七,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1册,第470页。

⑤李梦阳撰,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卷首,叶一。

⑥此处的“构件”概念,详参徐雁平:《清代文派与文体论丛》,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143页。

中集》的典故,表明“欲传之亲故,冀其不忘于今”^①,如好友张含“寄赠予诗,半之贮之巾箱,以比元次山之篋中云耳”^②,知己朱曰藩诗集“但择其愜心而必传者七十四首,如昔人篋中之集藏之,仍归其原帙”^③。如果被评点者地位高于自己或关系不够紧密,杨慎则列举大量典故加以解释。《箬溪归田诗选》的作者顾应祥时任云南巡抚,杨慎撰写序文时非常严谨,使用苏武、李陵、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沧、马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等许多例证予以论说,并在最后将作者的态度呈现出来,说明自己的评选已然得到认可^④。对于丽江土知府木公《雪山诗选》,序文则连续使用曹植、谢朓、王籍、萧悫、王湾、崔信明、惠施、卢殷等典故强调“是足以传矣,岂在多乎”^⑤。

另一方面,序文经常使用带有“传”字的语句来强调评点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杨慎会表明评点者对诗歌的加工具有权威性,如挚友张含“乃属余选其自少至老之作的然必传者凡八卷”^⑥,契友朱曰藩诗作“但择其愜心而必传者七十四首”,同僚刘常以其父刘玉“全集属慎选其必传诗文为若干卷”^⑦,等等。他还表示,自己摘录的云南地方官兼忘年友顾起纶的15句诗“皆媲美古人,擅名艺苑,有句如此,一足传矣,况其多乎”^⑧。在邀请者或评点者看来,经杨慎评点的诗集皆是“必传”之作。然而在前辈及诗坛名家李梦阳《空同诗选》中,杨慎序文没有直接说明自己评点的权威性,而是由张含《空同诗选序》通过二人问答的形式将自己的观念呈现出来,强调“传精”优于“传全”^⑨。针对严嵩诗集,杨慎《钤山堂诗选序》虽然引用曹植、谢朓、王维、孟浩然等典故说明“诗贵精不贵多”,但指

①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第362页。

②杨慎:《滴艇霭迳引》,张含:《张愈光诗文选》附录,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1册,第504页。

③杨慎:《朱射陂诗选序》,朱曰藩撰,杨慎批选:《池上编》卷首,叶一。

④杨慎:《箬溪归田诗选序》,顾应祥撰,杨慎评选:《箬溪归田诗选》卷首,叶一至二。

⑤杨慎:《雪山诗选序》,木公撰,杨慎批点:《雪山诗选》卷首,叶三至四。

⑥杨慎:《张愈光诗文选序》,张含:《张愈光诗文选》卷首,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1册,第333页。

⑦杨慎:《执斋先生选集叙》,刘玉撰,杨慎评选:《执斋先生选集》卷首,叶一。

⑧杨慎:《玄言斋集序》,顾起纶:《泽秀集》卷首,叶十五。

⑨李梦阳撰,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卷首,叶一至二。

出这是遵循严嵩“属为选取”之意,强调严氏此举“合于王、孟之见”^①而并未凸显评点的重要性。

除却考量与评点对象的人际关系外,杨慎在评点时人诗集的过程中,还需直面文本中既存的序跋、批注等各类副文本。由于其评点成果最终将与这些副文本共同呈现于包括作者在内的读者群体面前,而既有副文本对作品与作者的品评往往与自身观点存在差异,因此杨慎经常运用一些评点策略,规避与原有副文本产生明显的观点冲突。

当杨慎的编选、批注与已有副文本存在差异时,序跋中则会明确肯定前人的评论。杨慎评选木公《雪山诗选》是在张志淳所评《雪山始音》、张含所评《雪山庚子稿》、李元阳所评《玉湖游录》及自己所评《仙楼琼华》等基础上完成的。尽管他在《雪山诗选序》中对其他人的评点多加赞同,但所选诗歌并非皆有他人批注。如《雪山始音》原有张志淳批注 71 则,但《雪山诗选》所选《雪山始音》25 首中仅有 14 首有张志淳批注。可资对照的是,《仙楼琼华》带有杨慎批注的共 17 首诗,仅 1 首未入选《雪山诗选》(《仙楼琼华》有 23 首诗入选)。又如刘玉诗作,被《执斋先生选集叙》赞为“妥帖排纂,入古作者之室”的《秘狱四咏》《歌风台》《百舌》《志怪行》《石钟山歌》等,诗句于“唐人何让”的五言律《回龙驿》《三湖寺》《圣福寺次韵》《归途》《江行》、七言律《京口登驿楼值雨柬林太守廷元》等,皆无杨慎批注^②。此外,杨氏评点陈凤《清华堂稿摘存》时已看到冯惟讷序,对于冯序所称“雅秀清畅,王、孟之流也”的五七言近体,杨慎没有循此继续发掘其中的“王孟诗风”,其批注几乎未使用该参照系;至于“少伤平淡”的五言绝,杨慎则无批注。但为避免与冯惟讷产生明显分歧,杨慎在所作序文中仍称“其诸体之分,信如冯子之评,走所深致者”^③。

反之亦然,倘若杨慎于序跋中表达不同看法,则另以批注明确表示认同。顾起纶《泽秀集》所选录的《玄言斋集》诗作有 11 首被王问、杨慎共同批注。在评论同一首诗时,杨慎至少 6 次以对话的方式赞同或补充王问的评论,例如:

①杨慎:《太史升庵遗集》卷二三,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31 册,第 305 页。

②刘玉撰,杨慎评选:《执斋先生选集》卷首,叶三。

③陈凤撰,冯惟讷编,杨慎批点:《清华堂稿摘存》卷首冯惟讷、杨慎序,叶一至叶二。

王云似岑。杨云王评是。(卷四《送王忠州》,叶一)

王云初唐。杨云学初唐者,语虽丽而易陈,此独清新无蹈袭。
(卷五《洪应雷坛恭述》,叶五)

王云用连字新妥。杨云唐人有“树树树头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之句,已是新异,然止用之绝句。此入律对,可谓青出之蓝。
(卷六《初夏闲居》,叶五)①

实际上,《玄言斋集》原书共有王问批注 52 则,杨慎《玄言斋集序》着重肯定的 15 篇诗作的警句中仅《送赵石埭》《客居秋怀六首》《憩吴桥庵呈万丈》《闲居》《归草堂作》5 篇有王问批注 6 则。尽管《玄言斋集序》的摘句含蓄地反映出杨慎与王问看待顾起纶诗作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批注中并未表露,反而屡屡呼应王问批注。

综上,杨慎的批评观念并非单一依托编选、批注、圈点、序跋撰写等任一评点方式呈现,而是完整蕴含于各类评点手法的综合运用之中。受与创作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制约与影响,其序文在用典内容、数量上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且文中“传”字句的有无,亦形成了评点权威度的层级区分。正是“副文本在场”的特殊批评语境,促使杨慎形成了兼顾平衡的评点策略,在认可他人评论的同时,含蓄委婉地阐发自己的主张。

(二)评点话语中的“六朝”世界

杨慎评点时人诗集,大多以“六朝”为参照标准,唯有《执斋先生选集》《箬溪归田诗选》二书例外。由此足见,六朝文学对杨慎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②。

嘉靖二十二年杨慎评点的《空同诗选》(以下简称“《空同》”)即刻意凸显李诗的“六朝”因素。《空同》从 2149 首诗中选出 136 首“精之中精者”,且仅有 30 则批注,其中 15 则使用的参照系包括《毛诗》、《越人歌》、汉调、汉魏、古乐府、三谢、《文选》、王维、李白、杜甫等。杨慎以“可逼三谢”,“置之《文选》,亦不能辨”,“句法虽与《选》殊,而与少陵上下矣”③评价这些最精华的诗作,和李梦阳诗歌的创作追求、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

①三条引文皆出自前引《泽秀集》版本,为避繁琐,仅随文括注卷数和叶码。

②关于杨慎对六朝诗歌的重视,详参雷磊:《杨慎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6—113、130—137 页;郑利华:《明代诗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第 362—375 页。

③李梦阳撰,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卷一《温太真墓》,叶十;卷一《酬伊阳殷明府追忆见寄十四韵》,叶十一至十二;卷一《乙丑除夕追往愤五百字》,叶十三。

大的距离^①。

但在七年前的嘉靖十五年,杨慎《皇明诗钞》收录李梦阳诗 31 首^②,其中 5 首不见于《空同》,18 首见于《空同》而无批注,剩余 8 首中有 6 首的批注以李白和杜甫作为参照系,尚未特别关注其中的六朝诗风。如果选本《皇明诗钞》的编纂目的是构建过往的明诗史,那么诗集评点则是杨慎与时人建立关于“六朝”联系的载体,《空同》的刻意营造其实是在“破”与“立”中形成典范。

杨慎评点时人诗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二十二至三十五年,正值前后七子之间的过渡时期,很早便被批评家关注。与杨慎大约同时的徐泰在谈论明中叶诗坛格局时,将杨慎作为与薛蕙、马骥并列的诗人,“若薛蕙、马骥、杨慎之俊丽,晋康乐、唐四杰殆不是过云”^③。胡应麟也强调这一时间段以及杨慎的特殊地位:“杨用修才情学问,在弘正后、嘉隆前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格不甚高,而清新绮缛,独掇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④杨慎对六朝诗学的弘扬,既落实于自身的诗歌创作,亦体现在对时人诗集的评点实践之中,用评点在时人诗集中创设出“六朝”世界。据统计,杨慎批注李梦阳《空同诗选》,“六朝”条数占带有参照系的批注总数的 13%,严嵩《钤山堂集》《直庐稿》的比例是 34%,木公《仙楼琼华》的比例是 67%,张含《张愈光诗文选》的比例是 23%,周复俊《泾林诗文集》的比例是 35%,陈凤《清华堂稿摘存》的比例是 29%,朱曰藩《池上编》的比例是 50%^⑤。正因为大部分“六朝”属于刻意营造,所以当阅读到真正与己契合的朱曰藩诗集时,杨慎的欢欣溢于言表:“维扬朱子射陂,以挹藻相契……独见射陂子之诗,犁然当于予心,盖取材《文

①详参宋莹莹:《杨慎评点明人诗歌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冯小禄指导),2018 年,第 65 页。

②杨慎编:《皇明诗钞》卷七,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嘉靖三十七年(1558)陈仕贤刻本(索书号:403.26 14304),叶一至十四。

③徐泰:《诗谈》,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6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406 页。

④胡应麟:《诗数续编一》,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8 册,第 3470 页。

⑤宋莹莹对部分诗集的“诗歌之源”有更详细的统计(《杨慎评点明人诗歌研究》,第 61—67、103—116 页)。

选》《乐府》而宪章于六朝、初唐,不事蹈袭,不烦绳削,可以鸣世兴后矣!”^①某种意义上,杨慎的时人诗集评点已经超越社会关系的影响,成为他推广六朝诗学和确立文学同道关系的重要手段。

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是静态的各个类型,而且是动态的相互配合,更是批评家在社会关系影响下的综合运用。相应地,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会导致评点方法使用的层次性,因而需要在“评点群”中解读评点。掌握确定能否“必传”权力的、持有特别明确诗学主张的评点者,往往能够超越社会关系的束缚,通过评点推广自己的诗学主张。

三、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对诗坛权力格局的塑造

杨慎的评点对被评点者产生了怎样影响?杨慎通过时人诗集评点构建的“六朝”世界,又对他“自成一队”“独立门户”的诗歌史地位具有怎样的作用?本节将讨论这些问题。

(一)以杨慎为中心的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

在现代学者的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派别现象的贯串存在“体一派”“群一派”“社一派”三种范式^②。然而,“体”的差异是否必然造成“派”的区分,“群”的形成是否可以跨越区域,“社”是否包含所有文学关系;如果说“体”“群”“社”的基础是求同,“派”中必然存异,那么如何在“同”的基础上处理“异”,“异”达到何种程度会发生质变而形成两种不同派别,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考究。

就杨慎的时人诗集评点而言,他和被评点者之间的关系很少依托结社。这些被评点者主要来自云南、南京、吴中等地区,诗学观念也与杨慎不尽契合。若进一步拓展由杨慎及其评点对象所构筑的明代诗集评点关系网络,可将李东阳、杨一清、康海、皇甫汈等文坛核心诗人,以及茶陵派、前七子等重要文学流派纳入其中。探究以时人诗集评点、评点关系网络形成的文学关系和诗坛格局,或许可以为观察乃至构建文学流派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将时人评点的诗集作为纽带,继续串联相关的作者和评点者,可以呈现以杨慎为中心的,由作者、评点者、新的作者、新的评点者共同构成的时

^①杨慎:《朱射陂诗选序》,朱曰藩撰,杨慎批选:《池上编》卷首,叶一。

^②张涛:《古代文学派别范式衍变与理论体系重构》,《文学遗产》2023年第4期,第179页。

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①(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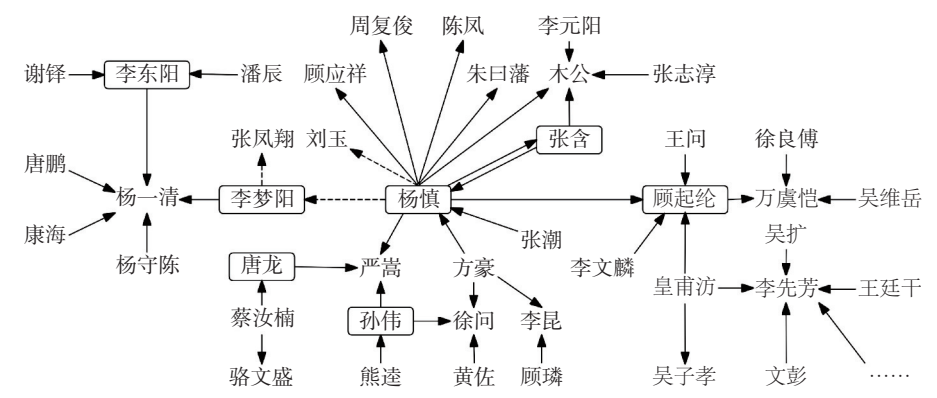


图1 以杨慎为中心的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②

该评点网络呈现出的明中叶诗坛格局总体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囊括从弘治、正德的李东阳到隆庆、万历的顾起纶等至少43位文人,38种诗集,前后跨越五十余年,涉及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以及云南、南京、吴中等地诗坛。

其二,各位作者与其评点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作者的诗集因被评点者阅读而发挥效用,评点者反过来利用评点影响作者;杨慎、张含之间存

^①除前文已经提及的杨慎时人诗集评点本外,现存相关评点本诗集还有如下20种:

1. 李东阳撰,谢铎、潘辰评《拟古乐府》二卷;
2. 杨一清撰,李梦阳、康海、李东阳、杨守陈、唐鹏评《石淙诗稿》十九卷;
3. 张凤翔撰,李梦阳评《张伎陵集》七卷;
4. 严嵩撰,唐龙、孙伟评《铃山堂诗钞》二卷;
5. 唐龙撰,蔡汝楠评《渔石唐先生诗集》八卷;
6. 骆文盛撰,蔡汝楠评《两溪先生遗集》七卷;
7. 孙伟撰,熊逵评《鹭沙诗集》二卷;
8. 徐问撰,孙伟、方豪、黄佐评《山堂萃稿》十六卷《山堂续稿》四卷;
9. 李昆撰,顾麟、方豪评《东冈小稿》五卷;
10. 木公撰,张志淳评《雪山始音》二卷;
11. 木公撰,张含评《雪山庚子稿》一卷;
12. 木公撰,李元阳评《玉湖游录》一卷;
13. 杨慎撰,方豪、张含、张潮评《杨升庵诗》五卷;
14. 杨慎撰,方豪、张含、张潮评《升庵诗集》九卷;
15. 杨慎撰,方豪、张含、张潮评《升庵先生文集》八十一卷;
16. 顾起纶撰,王问评《玄言斋集》二卷;
17. 顾起纶撰,皇甫汈评《昆明集》二卷;
18. 吴子孝撰,皇甫汈评《玉涵堂诗选》十卷;
19. 李先芳撰,皇甫汈、王廷干、吴扩、文彭等评《李氏山房诗选》六卷(存两卷。其他评点者宋、苏、朱、马等人暂无法考证);
20. 万虞恺撰,徐良傅、吴维岳、顾起纶评《枫潭集钞》二卷。

^②直线起点表示评点者,箭头端表示被评点者。加方框表示既是评点者,又是被评点者。实线表示评点诗集时作者在世,虚线表示评点发生在作者去世之后。

在互相阅读和评点,彼此施加影响;李梦阳、刘玉在杨慎评点之前已经去世,他们和杨慎的关系是评点者只能塑造而非影响被评点者。

其三,李东阳、杨一清、李昆、木公、严嵩、徐问、杨慎、万虞恺、顾起纶、李先芳等人的诗集具有多位评点者,这类被评点者通常拥有较高的世俗权力,以各自为中心分别构成不同的时人诗集评点群,成为整体网络中的“基础群落”;李梦阳、孙伟、方豪、张含、杨慎、皇甫汈、蔡汝楠等人评点多位作者诗集,是该网络形成的推动、联结力量,而且属于评点名家或大家,拥有相对集中的“评点权”;李东阳、李梦阳、张含、杨慎、顾起纶既是评点者,又是被评点者,具备上述两种功能,可称为“重要节点”。

其四,杨慎、张含、木公为一组,严嵩、孙伟、黄佐、方豪、杨慎为另一组,形成两个独立的评点关系圈。前者依托基础群落与重要节点紧密联结,圈内人物关系较为密切;后者缺少重要节点支持,成员之间亦无其他交集。

尽管由于文献限制,该网络无法全面呈现明中叶诗坛格局,但如果将其中涉及的诗人视为当时诗坛的一类特殊群体,这种“不完整”恰恰能够呈现出区别于文体划分、地域聚合、文人结社等传统维度的新型诗坛组织结构。循此关注该网络的局部关联,可有效探析文学群落内部的特殊构造。

(二)杨慎评点活动的群体互动与诗学传播

以木公诗集评点为中心形成的云南评点群,主要包括木公、杨慎、张志淳、张含、李元阳等人。频繁的评点,对木公、张含二人的诗学观念产生明显影响。在杨慎之前,木公诗集的评点者很少将其诗作与“六朝”对应,嘉靖二年张志淳评点木公《雪山始音》主要着眼于和杜诗比较^①,二十四年张含指出木公诗“若有得乎四唐之风音矣”^②。二十五年,杨慎评点《仙楼琼华》时开始强调其诗歌与《文选》的关联,认为《书迎仙楼》“‘山图园客’,善用《文选》”,《碧关朝霞》“用《蜀都赋》‘纾丹气而为霞’最切题,且见怀乡之意,妙句也”^③。木公对此表示认同,又于二十八年邀请杨

^①如《雪山始音》(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滇甲 436/4080.1)卷上《寄友人莫静夫》有“尽有杜机轴,非今日诗家所能”(叶五),《秋日述感》有“意句俱佳,又不失杜体”(叶五)等张志淳批语。

^②张含:《玉湖游录诗序》,木公:《玉湖游录》卷末,云南省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索书号:滇甲 436/4080.6),叶一。

^③木公:《仙楼琼华》,叶一、叶二十三。

慎评选《雪山诗选》。

杨慎自贬谪云南后,几乎每年都收到张含小集并为之撰写序跋,同时评点过《禺山诗》《漓艇霭酒》《张愈光诗文选》《张禺山戊巳吟》《升庵选禺山七言律诗》等诗集,故其《禺山癸卯诗序》写道:“予喜其每变每进,殆百战健儿,屡鼓不竭。”^①除此之外,张含《空同诗选序》记录自己对杨慎“诗弗可弗选也,选弗可弗严也”评点观的赞同和接受^②;杨慎《朱射陂诗选序》记载自己“尊六朝之甚”的解释,使得张含承认“非夫子之发吾覆也,吾几误一生”^③。可见时人诗集评点对于推广诗学观念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具体的评点内容,还体现在评点行为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张含至少先后两次评点杨慎诗集,同样展现了对杨慎“六朝”诗学的接受过程。《杨升庵诗》(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索书号:A01659)仅有3则张含批注,都未将杨慎诗作与“六朝”联系起来;《升庵先生文集》中有10则张含批注,其中1则张含自称“予点升庵诗,不喜其深邃,而喜其朗爽也”^④;另有4则使用参照系,将杨慎诗歌与谢灵运、李白、杜甫以及初唐、王勃、杨炯等关联。从《杨升庵诗》到《升庵先生文集》,方豪的批注亦存在类似转变,突出杨慎诗歌中的《文选》、六朝特色。即使如张含、杨慎这样关系密切的诗人群体,其诗学追求并非一开始就彼此契合,而是在持续的评点乃至互评中不断趋同,形成紧密的文学同道关系。

朱曰藩首次寄给杨慎的信中表示,童时“即知海内有升庵公,迄今三十年余,忝承绪业,不敢失坠。研求之余,益觉斯文正脉有在……某何幸,乃亦获与闻于公,以为终身旌镜,慰甚慰甚”^⑤。由此可知,朱曰藩一开始的取法杨慎属于私淑。嘉靖二十八年,杨慎回复朱曰藩此信说:“反复佳什,出于《文选》《乐府》而铸以伟辞新律,效于六朝、初唐而溯之左晋、邺中,盖艳而有骨、丽而有则,古不乖时、今不同敝者,必传之作也。”^⑥另外

①张含:《张愈光诗文选》附录,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1册,第501页。

②李梦阳撰,杨慎批选:《空同诗选》卷首,叶一。

③朱曰藩撰,杨慎批选:《池上编》卷首,叶二。

④杨慎:《升庵先生文集》卷十二《青蛉行二首寄内》,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1582)刻本(索书号:线善T05690-705),叶四。

⑤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三二《寄升庵书》,《扬州文库》第98册,第256页。

⑥杨慎:《升庵杨公书》,朱曰藩:《山带阁集》附录,《扬州文库》第98册,第266页。

还评点朱氏所寄《池上编》并作序,于三十四年为之刊印。川滇与南京之间相隔数千里,杨、朱二人又应该未曾晤面,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系较为有限。然而,杨慎评点《池上编》改变了朱曰藩私淑自己的性质,是对二人文学传承关系的确认,使得跨越空间形成的文学连接得以实现。也因此,杨慎之于朱曰藩具有特别的意义:“升庵先生在江阳,以厥象托玉泉陈君寄我白下,予即揭于白下寓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①

不同于云南评点群和朱曰藩,顾起纶、皇甫汈等人既在西南与杨慎形成评点群,又属于另具传统的吴中文人群。皇甫汈、顾起纶任职云南,使得严嵩诗集先前的加工者杨慎、皇甫汈与稍后的加工者顾起纶有机会合作,将各自评、选成果凝聚到同一种书籍之上,从而促进杨慎等人的进一步评选^②。皇甫汈、杨慎皆曾评点顾起纶诗集并为之撰写序跋,这些诗集的评点、出版也有利于凝聚评点群体,使得杨、顾、皇甫三人在川、滇之间形成评点群。尽管存世的皇甫汈诗集中没有杨慎评点本,但万历二年(1574)皇甫汈自述在人生各阶段曾分别取法关洛之音、楚音、江左之音、燕赵之音和以杨慎为代表的蜀音等:

自澶州移栝,迁滇臬,遐陬罕晤,仅得张子舍、李子元阳。若杨太史慎,先已徙泸,数移书相诏示,而观察周满、贵州学宪谢东山亦以诗交,有渊、云之余风焉,则又间为蜀音。^③

除张含、李元阳等云南本地文人群体,皇甫汈、顾起纶与杨慎所形成的评点群同样影响到皇甫氏的学诗历程。杨慎对顾起纶的影响,则在诗集评点中有明显体现。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王问《书玄言斋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杨慎《玄言斋集序》、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杨慎《书昆明集》和是年孟春皇甫汈《昆明集序》皆未强调顾起纶诗作带有“六朝”诗风,此时《昆明集》尚未得到杨慎评点。嘉靖三十四年之后的集序作者则强调其诗中的“六朝”。三十七年李文麟说:“尝论诗之高品,古体必称陶、谢,所致在澹而洁;近体必称王、孟,所致在逸而秀……斯集既出,直追

①朱曰藩:《山带阁集》卷三一《人日草堂引》,《扬州文库》第98册,第249页。

②如《振秀集》较之《铃山堂集》《直庐稿》,其诗歌编排次序不尽相同,并新增杨慎批注数则。

③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首《集原》,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年(1574)皇甫汈自刻本(索书号:17204),叶二。

沈、宋,驰骋艺场,未知孰最上乘。”^①不仅如此,顾起纶也开始使用“六朝”参照系评点他人诗集。嘉靖四十年腊月既望,顾起纶《枫潭集钞叙》虽称万虞恺“继响王、孟”^②,但其使用参照系的50则批注中有9则言及陆机、陶、谢、《文选》、初唐或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换言之,从杨慎评点顾起纶诗集,再到顾起纶评点万虞恺诗集,“六朝”在评点网络中的旅行,是杨慎诗学传播的另一种形式。

(三) 评点关系网络的文学史意义

以杨慎为中心的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对整体认识明中叶诗坛格局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再现明中叶诗坛的组织结构,有助于探究诗学思想交互、文学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路径。评点本诗集主要通过“阅读—反馈”的方式在该评点网络中发挥媒介作用,将以单部诗集形成的“作者—评点者”关系拓展到诗集群形成的“作者—评点者+”的传递链条中。例如张含阅读杨慎诗集,杨慎阅读李梦阳诗集,李梦阳阅读杨一清诗集,可以呈现文学群体代际更迭过程中的诗集传播脉络。

其次,赋予相关作品的创作、编辑、阅读、出版、流转等活动在评点网络中的位置,还原当时视角与行为驱动。杨慎晚于李梦阳近三十年去世,周复俊、顾起纶同样晚于杨慎二三十年逝世,因而无论是杨慎借评点重塑李梦阳,还是周、顾二人对杨慎评点的删弃,都呈现出明中叶诗坛代际更替的特征。尽管杨慎是否评点过皇甫汈诗集不得而知,但皇甫汈的“间为蜀音”应当存在杨慎、顾起纶与自己所形成的评点群的影响。杨慎、严嵩、孙伟、徐问、方豪组成的评点圈,将他们各自的评点行为整合起来,使单个的评点获得在评点圈中的具体位置。将“一评多”“多评一”置于关系网络中解读,有利于发现其内在理路。根据各人之间关联的多寡强弱,可以界定、明确群体的范围。

再次,时人诗集评点形成的文学关系网络,本身即具有文学史意义。一方面,茶陵派、前七子、云南诗坛、南京诗坛、吴中诗坛等不是彼此孤立的文学群体,他们之间存在以诗集评点为基础的诗学关联。所谓“中心—边缘”框架似乎并不存在,该评点网络呈现的是明中叶整体诗坛的

^①李文麟:《书勾漏集》,顾起纶:《泽秀集》卷首,叶十八。

^②万虞恺:《枫潭集钞》卷首,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索书号:402.6 12172),叶二。

某种组织构造。另一方面,明中叶文学群体内部的关联方式出现革新。在杨慎之前,李东阳等“茶陵派”、李梦阳等“前七子”文学流派内部很少借助时人诗集评点缔结文学关系。杨慎的时人诗集评点,标志着文学共同体构建机制的变化。

要而言之,时人诗集评点缔造出不同于交游、结社、唱和、题跋等的文学关系,并且同样具有塑造、凝聚文学群体的功能。在与木公、张含等形成的云南评点群中,杨慎的评点内容和行为都成为凝聚文学群体并使之成为契合自己文学主张的重要方法。杨慎对朱曰藩诗集的评点,是双方诗学传承关系的确认,同时意味着文学群体可以跨越空间发生文学流派式的联系。还原出以杨慎为中心的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有助于剖析明中叶诗坛的组织结构、感知文学活动的当时视角和行为驱动、把握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等,为审视文学流派的构建提供基于关系与过程的视角和途径。

结语

杨慎在对时人诗集做评点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必然和偶然因素。个人际遇、地方官员等都不断影响杨慎的评点方式和最终呈现,进而牵涉到关于他的诗史地位书写。社会关系固然会压缩文学批评的空间,但文学批评也能经过调适而超越社会关系。时人诗集评点,既是杨慎推广六朝诗学的工具,又具体呈现出他批评实践的效果。评点本诗集本身及其作者、评点者等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属于时人诗集评点关系网络中的局部和媒介。他们既在评点网络中发挥功用,又促进评点网络的组织连接,从而构造出诗坛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研究,宜重视诗歌别集特别是评点本诗集本身,进行以诗集为核心的诸要素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文学书籍史,既要关注作为作品集的文学书籍,又需重视围绕文学书籍而产生的书籍关系、文学关系、文学史关系,进而探究各类关系的生成过程与社会影响。文学史与书籍史结合,将为后续相关研究贡献更多方法和可能。

【作者简介】何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明代文学。